

【保定研究】

保定莲池书院的创建及其历史影响

魏隽如¹, 汤倩²

(1.保定学院 历史系,河北 保定 071000; 2.上海大学 外国语学院,上海 200444)

摘 要: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为适应科举考试需要而形成的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保定莲池书院是第四任直隶总督李卫所创办的官立书院,其教育目标定位于为科举考试服务,从而造就了众多封建官僚,培养出一大批文人学者。但随着科举制的废除,书院制度推陈出新,提倡自由讲学,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重视学术交流与争鸣,为我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现代教育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资源。这些因素或成分不仅有教育历史价值,更有其超越时空限制在现代教育语境下的现实意义。而且在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文化遗产保护、爱国主义教育、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中亦可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关键词:保定莲池书院;李卫;官立书院;教育改革;教育史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1-0122-05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为适应科举考试需要而形成的集教育教学和学术研究于一体的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保定莲池书院是第四任直隶总督李卫所创办的官立书院。

李卫(1687—1738),江苏徐州人,历任兵部员外郎、户部郎中、云南盐驿道、云南布政使、浙江巡抚兼理两浙盐政、浙江总督,1732年任直隶总督,直至辞世,跨雍正、乾隆两朝。其为官“操守廉洁,勇敢任事”,擅长治盗、赈济灾民,尤其是不畏权贵,敢于秉公执法,对贪官毫不留情,深受百姓爱戴,更深得雍正帝赏识,同鄂尔泰、田文镜并称雍正朝著名“模范”三督抚。乾隆元年(1736),李卫兼管直隶河道总督,其亲勘河道,行程三千里,终因积劳成疾,卧床不起,于1738年12月12日病逝。对李卫之死,乾隆帝异常悲痛,说:“公,累任封疆,实心办事,勇往直前,无所瞻顾。”派大臣驰往徐州李卫家乡“酬奠茶酒”,并下令,所过州县奠祭护送,死后谥号“敏达”^{[1]94}。

李卫不仅政绩显要,而且十分重视教育和文化事业,任浙江巡抚兼两浙盐政、浙江总督时,曾出钱修过《浙江通志》,还修复了当地的紫阳书院和敷文书院,深受当地民众称赞。其督直期间,最大的历史贡献是于雍正十一年(1733),奉旨在保定创办了莲池书院,因坐落于保定古莲池旧园林而得名。

一、莲池书院的创建

书院名称始于唐代,名扬天下于北宋,繁荣辉煌于明代,普及衰亡于清末,原为藏书与修书之所,而含有教育性质的书院之始为南唐建立的庐山白鹿洞国庠。北宋初年,有四大著名书院:石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与岳麓书院^{[2]11-12}。南宋书院兴盛,著名的亦有四: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丽泽书院与象山书院。四大书院的特点:一是私人设置,或是地方郡守修建,均不纳于官学系统之中,是南宋著名理学家、心学家讲学的地方,是不同学派的学术基地。二是明显区别于官学,形成了自己的教学风格,即重开自由讲学之风,因而成为中国文化教育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中华文明史上一条别有韵致的文脉,在历史的长河中延续了近千年。

收稿日期:2011-10-27

作者简介:魏隽如(1955-),女,河北唐县人,教授,主要从事区域历史地理研究。

保定莲池书院则是清代直隶省官办的最高学府和学术研究机构。

保定自元代张柔重新建城之后,历明至清初,先后为保定路、保定府、清苑县的政府所在地。明代于此曾建有上谷书院、二程书院和金台书院,可是早已废弃。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开始在直隶省设巡抚,省会由大名迁至保定,从而成为畿辅首郡和人文荟萃之地,府学、县学和社学、义学俱备,人才迭出。但历经顺治、康熙、雍正三朝近90年,却一直没有建立一所书院。究其原因,主要是保定紧邻京师,为南北交通的孔道,当地官员在没有朝廷明令的情况下是不敢主动兴办的,以免招致像明末东林书院那样的横祸。

雍正二年(1724),清政府将直隶巡抚改为直隶总督,总督衙署也设在保定,自此确立了直隶省会的地位。十一年(1733),雍正皇帝见民间兴办书院的势头不可遏止,便一改过去消极防范为积极支持的方针,诏令各省建立省级官办书院,力图以此来造就维护封建统治的得力人才。既然皇帝有了广建书院的明令,那么在保定创建书院的担子就自然落在此时的直隶总督李卫肩上。

接到皇帝诏书时,李卫正在浙江海宁协助指挥救灾,回任后立即召集直隶布政使王谟、按察使窦启英、清河道台彭家廉、保定知府朱寿图和清苑知县徐德泰等人反复会商,确定在“林泉幽邃,云物苍然,于士子读书为宜”的古莲花池北边创办莲池书院。修建书院的经费一部分是公费,不足部分则由李卫捐献养廉银补足(清代官员的正俸相当低,作为“从一品”官的各省总督岁俸仅有银180两和米180斛,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养廉银”。直隶总督李卫的养廉银每年约15000两),这是李卫捐资助教的历史贡献。

莲池书院是在原有的房屋、廊庑的基础上“因旧起废”建起来的,工程于雍正十一年五月动工,九月落成。竣工之后,被命名为“莲池书院”。为了从地域上区别,有的也称之为“直隶书院”或“保定书院”。李卫曾撰有《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碑文详细记载了莲池书院的修建过程、建筑分布、经费来源、管理等情况^{[3]7-10},此碑今仍立于保定市莲池博物馆内。

莲池书院从1733年创立到1908年废除,前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等八代皇帝,达175年之久。作为科举制度的产物,从皇帝到总督无不牢牢地控制着它,因而书院的设备、经费和教师薪水等开支均由政府定期在财政税收中拨发。李卫还采取了一项永久性措施,即将雍正皇帝在建书院之初恩赐的1000两银购置学田数十亩,招人佃种,“岁课租以资膏火”,从而保证了书院学生的日常开支费用。

二、莲池书院的教育改革

莲池书院自创办以后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在保定教育史上以及为中国书院教育制度书写了光辉的一页。

院长(习称“山长”)为莲池书院的组织者和行政领导,把握着书院的办学方向,关系着人才的培养和书院的声誉,故院长人选历来由直隶总督聘请海内外学识渊博、品行端正和威望崇高的名师大儒担任,据史料记载可以考证的院长有:张叙、汪师韩、章学诚、黄彭年、何秋涛、王振纲、张裕钊、吴汝纶等。他们不仅是管理者,更是书院的主讲、名师或大师。

张叙,雍正十年(1732)举人。其精通经术,著作有《易贯》、《诗贯》、《孝经精义后录》、《或问余论》;《莲池行宫十二景图》亦有其题咏,是一个“经明行修”的院长。

黄彭年,道光二十七年(1847)进士,著名的考据学家,曾两次担任莲池书院院长。他博学多能,诗文兼擅,书画并长,颇负名望,还是一个具有开拓精神的创新型人物,他对书院的主要贡献是:

(1)扩建校舍、增添图书,明立章程、严定课程,改进课艺内容和形式,增开朴学课程。朴学也叫汉学,是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继承汉儒学风而形成的训诂考据之学,“朴学”的开设使史学、文字学上升为与经学同等的地位,改变了书院那种传统的专以习帖括应科考为事的旧习。

(2)同治十年(1871),黄彭年受总督李鸿章之聘,率领师生编纂《畿辅通志》。

(3)建“学古堂”和阅览室,开创了研究性教学模式。光绪八年(1882),黄彭年在万卷楼(莲池书院的藏书楼,其最多时藏书曾达到3万余卷,犹如现代学校图书馆)前面建“学古堂”,作为讲授古课(即科举考试文字之外的经史学问和策论的一门课程)和进行朴学研究的专门场所。还把万卷楼底层辟为阅览室,组织学生阅读万卷楼新购进的33711卷经史子集四部图书,使得读书“日有课程”,研究成果“月刊一册”,“行之数年,朴学之士济济盈庭矣”^{[4]60}。这种学术活动,改变了以往专事课艺的沉闷风气,开创了研究性教学模式,使书院由单纯的教学育

人朝着学术研究方向转化,以致莲池书院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机构。

张裕钊,道光二十六年(1846)举人。与薛福成、黎庶昌、吴汝纶并称“曾门四弟子”,曾国藩常赞言曰:“吾门人可期有成者,为张裕钊、吴汝纶两生耳”。张裕钊对书院的贡献主要有:

(1)首开接待外国访问学者和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先例。日本名流宫岛诚一的儿子宫岛勘斋曾慕名渡海前来拜访学习,追随张氏学习8年,回国后创办了善邻书院,并成为日本的一代学者宗师。日本汉学家冈千仞来华访学时也曾向张氏请教,对促进中日文化交流和中日友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引导学生学习书法艺术。张氏书法融古代书法之长,吸收隶体笔法,自成一家,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南官县学碑》是张裕钊任莲池书院院长时所作,其拓本风行海内外,许多书法家、金石家、收藏家视其为珍宝,形成了一个以“南官碑”为主的书法流派,并远播海外。近年流行的“新魏体”即是由张裕钊一类字演化出来的美术字。

吴汝纶,同治元年(1862)进士,他学贯古今,通达时变,曾以古文家和教育家闻名于世。光绪十五年(1889)至二十七年(1903),任莲池书院最后一任院长。其一生主要的教育活动即主讲于莲池书院,并且推行了与同时代官学不同办学机制的改革,其对书院的主要贡献有:

(1)继续开办古学堂,培养出了一大批文学辞章之士,使桐城文派(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在直隶有了强大的阵容。

(2)提倡新学,尤重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学有所就”,主张废除科举,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主要著作有:《易说》、《诗说》、《深州风土记》、《尚书故》、《桐城吴先生文集》、《桐城吴先生全集》等。1902年,他赴日本考察学制,拜访了日本文化界知名人士,汇编成《东游丛录》四卷,成为我国第一部考查和研究外国教育制度的著作。

(3)力倡西学,东西合璧。吴汝纶为了与欧美“共竞”,不仅自己掌握了较多西学知识,还引导学生面向世界,创办了西学堂和东学堂,专修外文,并增设数学、理化课,招收外国留学生,首次开设日语、英语课,聘请日本人野口多内、英国人居格豪任教师。为了培养出一批精通外语,熟悉各国政治,能够宏济时变的人才,他率先将自己的儿子送进日语学堂,并鼓励和资助书院的学生赴国外留学,这在清末书院界独树一帜。吴汝纶所实行的一系列革新,推动了书院教育的近代化进程,因而成为我国近代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者。后来,清政府选定吴汝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

三、莲池书院的办学特色及其历史影响

经过历任院长的改革,莲池书院形成与其他书院不同的办学模式和施教方法,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1. 学制不定与生源广泛

莲池书院的学制并无固定年限,主要根据学生入学时的基础和三年一度的科举考试来定,一般约为三年。凡中举人、进士者即算毕业;余者学完规定课程,经甄别合格即可肄业,其中优秀者均可由院方推荐去充任基层公、教职事。书院每年正月招生,考生资格不论是否秀才,也无省区、籍贯限制,凡通过入学考试合格者即予以录取,因而生源范围很大,这在当时书院中影响深远。

清代书院由于经费原因,多数书院以招收本地学生为主,目的是为本乡学子提供读书受教的机会,因为招收外籍学生,势必挤占本籍学生名额。但是以地域限制生源的标准存在着很大的弊端:一是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生源的质量,不利于学生的互相促进;二是生源来自同一社会和文化背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容易趋同,会阻碍学术探讨中思想的碰撞与交融。由于李卫采取了保证书院日常开支费用的措施,加上历任直隶总督的重视和资金注入,莲池书院经费比较充裕,另外,历任院长的开明教育思想,充分打破了地域界限,接纳众多异地生徒,使得教育资源达到了共享与扩展,异地生徒荣归故里后,又反过来广泛地传播莲池书院的教育思想,使其名气大增。

2. 课程设置与开门考试

莲池书院设置的课程除了官方规定的《圣谕广训》、《大清律例》、“四书”、“五经”之外,经、史、子、集均广为涉猎,但由于各届主讲教师的专长和治学方式的不同,时有不同的侧重。

莲池书院的考试分为岁考、月考两种。岁考即学年大考,正月举行,及格者方能留在书院继续学习。月考是每月一次的考试,分为“官课”、“斋课”、“古课”三项。“官课”是由五大宪(即对总督、布政使、按察使、清河道员和知府的统称)分别做主考官,轮流拟、阅试卷的一种督察性质的考试;“斋课”是由院长根据教学进度所进行的阶段测验。这两种考试是针对科举考试而进行的模拟式测验,方式为开卷,内容一律是默写“四书”、“五经”的章句,并写八股文章和试帖诗各若干篇、首。“古课”则为闭卷,由院长出题考试经史策论,考试优胜者分列出一、二、三等,依次给以奖赏。“斋课”每次考试共奖银 8 两;“官课”随轮值主考官之意而定,为数亦不甚多;而“古课”的第一名每次奖银 10 两以上,考生资格不分院内生和院外生,考试待遇相等,以致每当考试,院外读书人都争先恐后徒步数十里前来应考。这种开门考试的办法,不仅显示出莲池书院的开放性与包容性,而且对于培养一代扎实的学风,起到了潜移默化的推动作用。

3. 学术导向和教学特色

莲池书院不仅聘请海内外名师大儒来掌学,还有“经学博洽,德行善美”的教授、主讲者授课,他们在日常的教学活动中发挥其特长,为学生展示出不同的学术导向和教学特色。清廷亦对其“恩隆优渥”,仅乾隆就曾 4 次“幸临”莲池书院,并赋诗嘉勉。一时间形成了“恢宏教化,声播四方”的局面,并成为北方最著名的一所省级书院,大儒名士无不以主学于此为荣,莘莘学子亦对其仰慕影从。师生代不乏人,名流荟萃。

乾隆初年在莲池书院任教的名师有孙嘉淦、鲁之裕、尹会一和夏文渊 4 人,他们大多是理学大师,“相与讲学,称为及盛”^[55]。乾隆后期的名师有汪师韩和章学诚等,嘉庆年间的名师有邵瑛、祁韵士,咸同时期的名师有何秋涛、李嘉端和王振纲等。

其中,章学诚主讲莲池书院时间最晚而且最长,其官至国子监典籍,兼通文史、地志、考据诸学,著作有《文史通义》、《实斋文钞》、《章氏遗书》等传世,无论是学术还是教学上都硕果累累。尤其是一些教育主张更值得关注。首先,他“教人为文,而不教人为揣摩之文”^[56]。所谓揣摩,是指揣度考官或皇帝的心思而投其所好的那些窍门。其次,他强调根基的重要性,要求学生先熟通经史的内容,再为文作诗,这样,“执笔而为举业,亦自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72]。他不但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教人为古文辞,“必以属文草稿示之”,使之“可以观草创之加润色也”,使之“可以见去取之有法律也”^[81]。另外,他提倡做读书笔记,教导学生“精字善句可备文料者,不妨小册摘之”^[92]。这些思想和做法在今天看来都还是科学和有益的。

祁韵士官翰林院编修,太子中允户部主事,精于治史,长于地域、中西交通之学,其遗著《伊犁总统事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等在史地学界享有盛誉,为西北史地学的奠基人。

由于名师的掌学和讲学,提高了书院的教学质量,扩大了书院的影响,声誉在全国众多官办书院中名列前茅,以至于前来学习者不绝如缕,因而造就了众多封建官僚,培养出一大批文人学者。据《保定府志》记载,其修业者“彪炳于仕途、议院、学校者,不可屈指”^[99]。其中著名的有王发桂、胡景桂、贺涛、刘若曾、苏维垣、清史馆总纂王树枏、藏书家傅增湘等。清末最后一名科举状元刘春霖以及北洋军阀总统冯国璋等也曾在此就读。

王发桂嘉庆年间就读于莲池书院,道光时成为进士,历任工、兵、刑、礼四部侍郎,通政司使。他与官至按察使的胡景桂等人同出自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门下,皆为直隶名士。

苏维垣,同治进士,担任四川知县,以清廉著称于世。其死于所任,发枢回籍时,万民致祭,“送者如市”,其中有一挽联道“一死有余哀,两袖清风满船明月;九原多饮恨,七旬老母三岁孤儿”^[144],读来叫人感动流涕。

莲池书院作为官学化的教育机构,是清代官办书院的典型和缩影,它是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培养人才,为科举考试服务而建立的。但随着 1905 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书院制度不得不推陈出新,其最大的历史贡献:一是开创了中国教育改革史上的先河。莲池书院的教学不同于当时其他的府、州、县学的八股式教学,而是推陈出新,增设外语、数学、理化课,提倡新学和自由讲学,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重视学术交流与争鸣,强调“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学有所就”,院内生和院外生的自学考试待遇相等,这些为教育体系向近代化的迈进、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现代教育思想的改革均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精神资源。这些因素或成分不仅有教育历史价值,更有其超越时空限制在现代教育语境下的现实意义。二是为晚清时代培育出大批政治、军事、法律、外交、工程、文、史、哲学诸多方面经世致用的人才。三是编辑出版了《畿辅通志》、《直隶省通志》、《清史稿》、《畿辅先哲传》、《兰道人百兰谱》、《陶庐文集》等传世之作。四是把北京智力、保定的地利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保定成为北

方文化分中心打下了良好基础。光绪年间,受莲池书院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凡在京师难以开办的新学,就转到保定创办。一时间,保定新学大兴,仅各类官立学堂就有33座,其中高等学堂10多座。后来的保定军校、育德中学留法勤工俭学班、定县(今定州)平民教育等,均与莲池书院的影响直接相关。这种现象,是国内其他城市所没有的,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河北教育史上,居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故1952年11月22日,毛泽东主席莅临莲池故地重游时说:“莲池之所以有名,关键是莲池书院有名,莲池书院在清末可称为全国书院之冠。”^{[5]114}

尽管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随着历史的发展离我们已经远去,但其间经历的兴衰变迁值得我们反思。尤其是在全世界都在呼唤终身教育的今天,现代化教育形式要与时俱进,但传统教育要保留,博学教育要坚持,这均可从古代书院那里找到精神家园,而且在文化传播与人才培养、文化遗产保护、爱国主义教育、旅游文化资源开发中亦可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

参考文献:

- [1]清史列传:卷十三·李卫[M]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
- [2]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四十六.学校考七·郡国乡党之学[O].清刻本.
- [3]李逢源,诸崇俭.清苑县志:卷十五·碑记[O].清同治十二年(1873年)版.
- [4]金良骥,姚寿昌.清苑县志:卷五·金石下·万卷楼书目序[O].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 [5]陈美健,孙待林,郭 铮.莲池书院[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 [6]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与汪龙庄简[C]//文史通义新编新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 [7]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八·清漳书院条约,引自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 [8]章学诚.章氏遗书:卷二十九·论文示贻选,引自仓修良《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 [9]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与定武书院诸及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0]金良骥,姚寿昌.清苑县志:卷五·金石下[O].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 [11]金良骥,姚寿昌.清苑县志:卷四·人物上·仕迹[O].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铅印本.

The Establishment of Baoding Lotus College and Its Historical Influence

Wei Junru¹, Tang Qian²

(1. History Department, Baoding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0, China;
2.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Abstract: Shu Yuan (academy of classical learning) is a special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ancient China, which is a product of feudal imperial competitive examination with the combining function of education and academy research. Lian Chi Shu Yuan (Lotus College) is an official one founded by Li Wei, the fourth Zhili Governor. With the end of serving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t has fostered numerous feudal officers and scholars. With the abolishment of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Lotus College put efforts to get rid of the stale and bring forth the fresh in order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learn by themselves and build up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academical exchange. All these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the modern educational revolution both physically and spiritually. These factors are valuable not only in the history field but also in the modern education. They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cultural transmission, personnel training,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education in patriotism, development of tourism, and so on.

Key words: Lotus College; Li Wei; Baoding; state-run Shu Yuan; education reform; history of education